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20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邓小平同志的巨幅画像在群众簇拥下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宪辉/摄



雏凤清于老凤声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胡宁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一名句，在上世纪80年代有着特殊的政治意味。陈云在80岁那年书写这句诗时，特意在条幅上补写了后来居上第三梯队的赠言。而这句话，也曾被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大上吟诵过。

所谓“雏凤老凤”，在当时的语境下，指的正是干部队伍中的年轻同志与老同志。怎么将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解决好，怎么让领导干部年轻化，是几乎贯穿了上世纪整个80年代的重要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的中高级干部队伍年轻化成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领导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十三大上要致力解决的重点问题。

1987年9月，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会见日本政治家二阶堂进一行时再次提到，十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都将比较年轻一些。

领导层年轻化是9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但做起来不容易。邓小平这样简明地阐述：年轻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一要保持政治的活力，第二要保持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年轻不行。

事实证明，一切也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在进行。相关资料显示，十三大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为64.4岁。同一届中央机构相比，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平均年龄明显下降。

有一则小故事，侧面反映了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努力正在逐步收到成效。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开幕当天，新华社记者李尚志找到时任中办主任温家宝，请他帮忙进入中央领导人的休息室。而当时，除了中央日常工作外，温家宝参与了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研究、起草工作。这一年，他只有45岁。

新同志提拔的同时，自然也要有老同志退出。早在1980年接受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便谈到：不但我辞职(指想辞去副总理)，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

而后，在中共十二大上，一大批老同志从第一线领导岗位上退出，经选举进入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他们的任务从担任具体的领导职务，变为“传帮带”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十三大时，中顾委也由十二大时的172位委员增加到十三大时提名200位候选人。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为这样的新老交替树立典范。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颖的著述中提到，1986年10月30日上午10时，邓小平、李先念来到陈云住处，3位老人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们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共同商定，在党的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经过反复酝酿，才议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仍担任一个职务；小平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同志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同志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在三老半退和四老全退的带动下，又有一批老同志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十三大时，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进入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尤其是正在酝酿的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班子的提名人选，基本上由年富力强的同志组成。

年轻化是否越好？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邓小平也给出了他的答案：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二，不能把年轻化简单地理解为越年轻越好，不能把年龄当成选拔使用干部的唯一刚性指标。其三，在干部队伍选拔配备上，年龄的条件不能说得过分，领导班子配备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形成梯级结构。

这一系列举措，对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稳定性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份努力仍在绵延，并且一步步接近并实现了党中央的目标。据统计，十四大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为62岁，进入政治局的胡锦涛、温家宝当时才50岁。

邓小平曾说过，当时的领导干部年轻化，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更多地是关系到我们的方针、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老同志带个头，开明一点好。

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背后，是一个国家领导层的传承与责任，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博大胸怀，亦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组织建设，向人民、向国家递交的一份庄严承诺。

(下转4版)

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屹立东方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 艺 尹希宁

1987年10月2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往后的改革之路定下基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是中国经济社会演变的特殊时期，新旧体制接轨，改革加快深化。

十三大报告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轮廓，指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根本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明确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报告特别强调，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记者，他们共同关注着、讨论着一个中心议题——改革。

改革、开放、透明，是十三大的基本特色。彼时采访十三大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马俊军回忆起那次大会时说：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第一次有这样的新姿态，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告诉世界中国的姿态。

巨轮的跨世纪三步走

中国犹如一艘航行在茫茫海洋上的巨轮，这艘巨轮正是通过不断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并不断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一程一程地驶向美好的彼岸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研究员鄢一龙曾这样形容中国的几次规划。

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跨世纪的规划。在此之前，中国在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只规划到20世纪末。

1979年12月6日，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向邓小平提问：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沉思片刻后回答，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使到了本世纪末，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国家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1000美金，我们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是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小康的目标。后来，邓小平考虑到20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会增长到12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1万亿美元左

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800美元多一点。邓小平特地对“小康社会”作了一个说明：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他一再强调，这个目标并不高，只是达到第三世界比较富裕一点国家的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还是落后的。

从规划的调整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令邓小平怀有信心。到了1984年，他将目光投向下个世纪中叶，形成了初步的“两步走”：一万亿亿美元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30到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有统计显示，1987年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国家财政收入还是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都大体翻了一番。截至十三大召开，1978年到1987年的9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旺盛、国力增长最迅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最多的时期。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以198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为基数，第一步是在80年代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1000美元，步入“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三步走的设想在十三大中以文件的形式正式确立。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中共之所以能不间断地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是因为中共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

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

中国到底处在社会主义坐标轴上的哪个位置？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观点。

经济学家冯兰瑞在1978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称，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几个阶段；我国当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在1959年年底，毛泽东在杭州集体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说过这个概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学家董辅初曾称中国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认为应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叶剑英在1979年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

一些争议声渐起。有人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了。还有人否认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否认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事实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在十二大及之前就出现过，只不过都在陪衬位置。1986年10月下旬，十三大报告起草组在京陆续召开理论座谈会。于光远强调：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从来都是最重要的问题。挑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时候了，要把初级阶段的特征搞清楚。

几个月后，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十三大要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这一实际，关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曾有过一段头脑发热、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期，并蒙受了脱离实际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灾难。以史为镜，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而又发展不平衡、经济、政治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等现实国情必须得到正视。

十三大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困、摆脱落后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立足于此，谋划长远。

改革是主旋律

十三大制定了进一步开放和搞活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第一次提出“全方位开放、开放格局、外向型经济”等新概念，向世界展示了坚定改革开放的中国姿态。

在邓小平看来，十三大还要干一件“都不容易，但非干不可”的事，那就是随着经济体

制改革深化，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进一步下放权力，党领导一切，不要包办一切。要搞成一部机器，一个合唱队，各干各的不好。

政治体制改革之初，在位于中国东北边境的辽宁省丹东市，一些基层单位曾经搞过民意测验，98%的人都举双手赞成。然而，改革一旦触及切身利益，一些人则惶惶然不安、不满起来。

彼时的十三大代表、丹东市委书记刘仲文告诉马俊军，人的观念的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开展的首要前提。理顺人的思想，远比制定出一个美妙动人的改革方案更为艰难。

刘仲文谈到机构改革的实际做法时表示，一方面要告诉人们，改革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历程，改革，就要打破坛坛罐罐，付出一定的牺牲；另一方面，要先立后破，实践造就人，要比靠说教造就人扎实、迅速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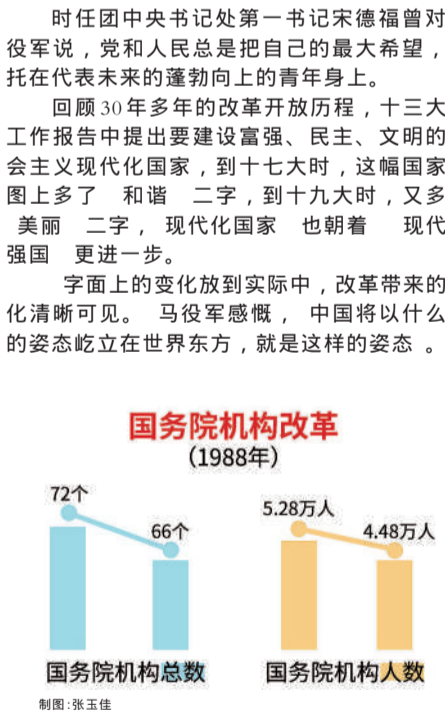
实践证明，先立后破的改革能够使人破釜沉舟，激发出更大的向上动力。

对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还要做的一件大事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提拔培养成千上万的中青年干部，保证党和国家的活力，为改革任务护航。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曾对马俊军说，党和人民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蓬勃向上的青年身上。

回顾3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十三大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十七大时，这幅国家蓝图上多了“和谐”二字，到十九大时，又多了“美丽”二字，现代化国家也朝着“现代化强国”更进一步。

字面上的变化放到实际中，改革带来的变化清晰可见。马俊军感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就是这样的姿态。



中国最大经济特区诞生记

在历史长河里走过2099年后，海南岛终于成为直属于中央政府的省级行政区。

公元前100年，西汉王朝在海南岛设置了两个行政地名：珠崖郡、儋耳郡。有了这两个地名，意味着孤悬海外的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也标志着中央政权开始了对海南岛的直接统治。然而，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海南岛要归广东管辖，要么归广西管辖，直至1988年年初，海南还是广东省下辖的一个行政区。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挂牌成立。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央还同时决定在海南省设立经济特区。全省成为经济特区，面积最大，国内唯一，海南由此进入了历史发展快车道，用一次次惊艳来展示自己的特区之“特”。

海南能够建省办特区，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震惊全国的“汽车倒卖事件”。

汽车倒卖事件是怎么回事？在《口述改革历史》一书中，曾任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省长的刘剑锋回忆说：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4个特区办了以后，广东省给予了海南岛一些特殊的政策，一个就是把原来的地级地区升格为副省级的海

南行政区，给了很多优惠政策，其中也包括一些进出口的特殊政策，但是由于大家经验不足，1984年、1985年、1986年海南利用这些特殊政策进口了许多免税的汽车，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汽车事件”。为了吸取教训，处分了海南行政区的领导人。

据统计，自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海南行政区党委、政府先后批准进口8.9万多辆汽车，已到货7.9万多辆，还有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甚至连一些学校、幼儿园也参与其中。

事发之后，当时的海南行政区一把手雷

宇被降级使用，原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因在海南汽车倒卖事件中的职务行为，于1986年5月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直至2004年2月才彻底平反。海南汽车倒卖事件由此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大事件。

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在200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事实上，海南人民非常感谢雷宇以海南汽车倒卖事件给当地上了市场经济的宝贵一课，它加速了海南的改革开放。

刘剑锋则回忆说：海南建省办特区这件事从中央来讲，据我了解是从“汽车倒卖事件”末期就提出来的。就是说海南岛

不能因为有了“汽车倒卖事件”就不发展了，重要的是吸取教训。

相关资料显示，1985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谈到4个经济特区的建设问题时说，4个特区办得好，为今后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如果说有不足，就是没有把海南岛列入特区。

1986年，梁湘(曾任深圳市委书记、海南首任省长)受王震的委托到海南进行考察。考察完了以后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里头就提出：一个是海南要单独建省，脱离广东省，再一个就是办一个特区，而且比其他4个特区还要大。刘剑锋回忆说。